

贵州东部 Hmub 人的生命史叙事与 城乡移动经验初探*

简美玲**

摘要：基于对贵州东部 Hmub 人展开的多年田野调查工作，本文以国家干部 Deik Bok 的生命史及其城乡移动经验为个案，勾勒出自 1950 年代到 2014 年的时代变迁以及台江 Hmub 人的个体生命史。在生命史叙事中，少数民族群体作为特定时代下的社会行动者，对其的讲述将现代性的发展与历史呈现为一个连续构成与再构成的多元文化故事。由此折射出地方社会、个人、群体关于现代性的亲身经验与社会实践，亦有助于深入理解人生历程构成与再现的现代性特征以及当代社会变迁的动力、轨迹及其现实效果。

关键词：城乡移动 生命史 叙事 多元现代性 Hmub 人 贵州

一 前言

1997 年以来，我在贵州东部 Hmub 人（此区域苗族的自称）聚集比例最高的台江县城及其周边的高坡村寨，进行田野研究工作。其中相遇或交

* 本文系“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多元现代性”之子计划“生命史叙事与西部中国的城乡移民研究（1930~2010）”（MOST 100-2420-H-009-001-MY3）部分研究成果。感谢台湾“科技部”经费的支持；感谢贵州友人对田野工作的协助以及多年来与我分享你们的生命史经验。谢谢我的学生们杜岳洲、潘怡洁、吴美玉、庄景宇、陈靖旻，协助田野资料与文献材料的整理。本文初稿发表于 2018 年人类学高级论坛：李亦园先生学术思想与中国人类学发展研讨会（武汉中南民族大学 2018 年 5 月 4 日~6 日）。最后特别感谢人类学界伙伴与前辈们：何翠萍、余舜德、徐杰舜、徐新建、李菲、刘璧榛，给予本文宝贵意见及关注。本文完成时，笔者担任 2018~2019 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国际共同合作计划学者（the Scholar of IPCR, CSEAS, Kyoto University 2018-2019）。感谢速水洋子教授与佐藤若菜助理教授对本文研究议题的意见交流。

** 简美玲，台湾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亲属、情感、性别、身体经验研究、历史民族志、语言人类学、医疗人类学。

往的长辈或友人,多半是从周边村寨移住到台江城头的第一代。有些退休的文人或官员,则可能来自清水江北岸的黄平、施秉(这两地早在明清时期,就曾有土司管理。比台江县城更早进入清帝国的治理与统御范围)。“成为台江人”是他们的生命史经验里共有的记忆。他们自身都有着与不同村寨往来或来往于清水江两岸的故事。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于2011年和2014年回访台江县城,进行当代Hmub人城乡移动现象、经济社会与文化之变迁的观察、移住居民的家屋与家屋外活动的参与观察并针对台江的Hmub人进行深度的生命史访谈。

他们的出生年代跨越1920年代至1970年代。他们述说着因“文化大革命”而导致的移住经验,或因工作而前往城市打工的经历,以及在不同地方打工所面临的语言、生活方式的差异等困境。这些个人的移动经验,凸显出到城市打工不仅是个人的抉择,背后更包含着中国国家的发展、改变以及贵州区域特殊的历史与社会文化脉络,乃至族群、性别、世代等因素所产生的差异。

这篇文章拟结合我在贵州东部高地的台江进行田野工作时所进行的生命史访谈及参与观察的田野笔记书写。在方法论上,我且称之为“生命史的民族志参与”。这样的研究经验与过程,是指我在台江地区以长达十余年的岁月,与几位主要报道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结合多年来面对面或书信往来的互动,并通过交谈、访问之生命史民族志的参与,这同时也是个以口述材料及书信、日记等语言材料为主的叙事研究。我想通过此种方式,感受与理解台江城头Hmub人的生命史叙事中的城乡移动经验与其中所展现的多元现代性。

为了呈现较为微观与丰厚的生命史口述材料,在这里我谨援引Deik Bok一生的城乡移动经验与当前他从国家干部退休的处境为例。我想阐述一个跨越1950年代到2014年前后的贵州东部台江Hmub人个人生命史转折里,所浮现的地方社会、个人、小群体对于现代性的亲身体验与微观的个人感受。本文最后拟指出,通过这一作为例子的民族志材料,其重要处在于,若要理解当代社会,应将现代性的发展与历史看成是一个持续构成的多元文化叙事。

二 背景

在进入较微观的个人生命史描述前,这篇文章拟先铺陈一个时代背

景。在中国崛起的当代，城乡间人口的大规模移动无疑是其中显著且重要的经验之一。城乡间的人口移动如何影响个人、家庭、亲属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村寨与村寨之间、村寨与县城之间界线的形成与破除，是当代中国的巨大现象之一，并且值得关注。城乡的人口移动及其与经济社会学的关联，在相对宏观的学科或研究取径并不是一个少见的议题^①。这些文献已指出，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群迁移至城市工作时，面临着国家制度、文化背景与生活方式等诸多差异的冲击与适应^②。

本文描述及讨论的个案，虽然聚焦于中年男性，但相关的文献已然提醒我们，以性别角度分析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流动的成因、特征及在原乡与都市所面临的差异处境，也指出女性的城乡移动可能面临双重边缘化的处境^③。

与本文探索城乡移动经验相关的文献，就理论观点上颇具启发的是文化地理学者 Tim Oakes^④与人类学家 Louisa Schein 在 2006 年合作编著的专书论文集——*Translocal China: Linkages, Identities and the Reimaging of Space*。他们采用了“跨地方”（trans-local）的理论观点，讨论中国地方社会的人群如何因应跨区域的流动而对于空间产生了新的联结、认同与想象。其中，与本文所要描述的对象在族群、地域、性别、教育、社会的

① 相关研究见王景新《新农村建设中传统村落及村落文化保护》，《中国乡村发现》2007年第5期；邵燕婷《十九世纪后期上海季节性移民的形成》，《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1（2）期；吴新慧《社会排斥与农民工子女的边缘化》，《书摘》2005年第6期；杨建华《从边缘走向中心：“打工文化”塑造的一条途径》，《浙江青年专修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1；刘海泳、顾朝林《北京流动人口聚落的形态、结构与功能》，《地理科学》1999年19（6）期。

② 参见李春玲《城乡移民与社会流动》，《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李伟梁《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第2期。

③ 参见杨筑慧《西南少数民族妇女外流与传统社会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王丽静、刘绍军《进城务工农民工作与生活状况的性别差异》，《农业经济》2006年第11期；何明洁《性别化年龄与女性农民工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07年第4期；杨国才《边疆少数民族妇女流动的特征及变化》，《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邱红、许鸣《从社会性别视角探析农村妇女向非农产业转移》，《人口学刊》2009年第5期；沈渝《城市融入中的社会性别研究》，《统计与决策》2010年第16期。

④ Oakes, Tim and Louisa Schein, "Translocal China: Introduction," *Translocal China: Linkages, Identities and the Reimaging of Space*, ed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1-35.

工作角色与国家的关系等, 有其差异或可相互对照的是 Louisa Schein^① 在该书的一章, 用前述的理论概念来探讨贵州苗族女性城乡移动的生命史。Schein 描述了同样位于贵州黔东南的西江苗族村寨女性, 经由打工、婚姻、文艺表演、生产民族手工艺品和服饰等不同渠道, 移动到中国其他大城市谋生。她指出苗族女性在城乡移动的过程中, 她们的身体经验、饮食习惯、外表装饰、服饰特色、族群特征与世界观等方面都经历了不同地域空间的分离 (dislocated)、转进 (emplaced) 与重置 (replaced)。Schein 所描述与讨论的西江苗族村寨外出的女性, 其城乡移动经验及其所再现的跨地方特性以及与族群或性别差异的对照, 都可能与本文所要描述及讨论的 Deik Bok 一生的城乡移动经验与其中可能被理解的意义成为对话的基础。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个背景, 是我们如何来解读在一个变迁的生命历程里, 个人作为一个主体, 如何面对移动与环境的转变并从中建立一种对自我的认同与对外在环境转变的理解。本文尝试借由与现代之探讨与反思攸关的理论观点, 作为一个对话的基础。爬梳在贵州东部苗族的个人生命史与移动经验的民族志资料里个体对于外在环境的变化以及如何呈现一种进展的感受或样态, 虽然不一定是直线方向的演进或质变。

Shumuel Eisenstadt^② 及 Bjorn Wittrock^③ 所提之多元现代性 (multiple modernities), Donald Nonini^④ 及 Aihwa Ong^⑤ 的另类现代性 (alternative modernity), Martin Jacques^⑥ 的本土现代性 (indigenous modernity) 和 Lash

① Schein, Louisa, "Negotiating scale: Miao Women at a distance," *Translocal China: Linkages, Identities and the Reimagining of Space*, ed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1-35.

② Eisenstadt, Shmuel, "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129 (1): 1-29, 2000.

③ Wittrock, Bjorn, "Modernity: One, None, or Many? European Origins and Modernity as a Global Condition," *Daedalus* 129 (1): 31-60, 2000.

④ Nonini, Donald and Aihwa Ong, "Introductio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as an Alternative Modernity," *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⑤ Ong, Aihwa, "Chinese Modernities: Narratives of Nation and of Capitalism," *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⑥ Jacques, Martin,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9.

and Friedman^① 的另一个现代性 (another modernity), 都是企图修正早期西方观点对于现代性的探讨。这些学者对于现代性的讨论, 朝向变动的、不稳定的, 关注现代主体的经验以及差异的叙事等社会文化面向。Eisenstadt 进一步从说故事的行动经验指出, 若要理解当代社会, 应将现代性的发展与历史, 看成持续建构与再建构的多元叙事, 亦即探索现代性如何形成于诸多不同的社会、政治与知识的行动中。这种从微观与动态的观点探索现代性经验的构成, 对于本文通过生命史的叙事语境来阐述台江 Hmub 人的城乡移动与其中所浮现的对现代性的感受有着相当的启发作用。

在前述城乡移动的文献基础上, 显示还需要有不同的或较为细微的理论观点来探入这个当代巨大现象的底层, 尤其是这个现象与地方社会亲近的互动处, 或农民工个人的生命经验之间的差异与断裂等。因此, 较为细致地面对拥有异质背景的贵州东部 Hmub 人 (性别、生长年代、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等) 自乡村迁移到城市的过程中所感知的迁移经验, 将能较具体与深刻地呈现个人微观的主体生命经验。在这样的构想下, 我在 2011 ~ 2014 年推动了一个研究计划, 由人类学民族志的微观视野来描述与阐释贵州东部说 Hmub 语的个人、家庭、村寨、县城, 在巨大的城乡流动现象里的个别与独特的微观历史经验。我试图将对个人的微观史经验及叙事的描述与解读, 放回历史的语境里——他们攸关语言、文化、生境、地景以及国家的控制与治理。从 1930 年代至 2010 年发生在贵州东部的城乡流动经验的独特性, 历经了 1930 ~ 1940 年 (解放战争前)、1950 ~ 1970 年 (计划经济时期)、1980 ~ 2000 年 (经济改革及发展时期)、2000 ~ 2010 年 (中国的经济崛起) 四个阶段。这个历程如何关联着黔东南台江 Hmub 人群移动经验中的跨世代特性与现代性, 这个所谓的现代性, 在贵州东部的社会与个人, 展现的又是何种内涵, 本文拟对此作出回答。

总之, 延续着前述学者反思现代性的基本理论关怀, 本文通过生命史叙事的语言行动以及结合我在 21 世纪以来往返与小住台江城头并与 1997

① Lash, Scott & Jonathan Friedman, *Modernity and Identity*, eds.,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1992.

年以来结交多年的台江 Hmub 长辈与友人的相聚、互动、交谈,对城头所见所闻的观察与参与观察,生命史叙事,一方面是拟收集、描述与分析的资料,一方面也是一种整合展演、存有与语言实践的理论取径。通过生命史叙事的逐字记录与细密的田野笔记书写,来探索中国边陲族群在城乡流动中所经验的现代性。

三 侧写台江好友的生命史与他的城乡移动经验

书写好友的生命史,其实内心有些忐忑。不过也因为在1997年夏秋之交,与好友的认识与结缘之初,我是个来到贵州东部进行苗族文化田野研究的人类学研究生。这一路的陪伴与对于苗族文化知识之介绍与相关田野探索的带领,已将近二十载岁月。2014年在贵州东部的台江县城,再见好友,他已从国家干部成为退休了的干部。我也从人类学博士生成为在大学教授十多年的老师了。

我称为 Deik Bok 的友人,是有如兄长般的,是我在台江最好的朋友。回忆1997年夏秋之际,贵州大学的杨老师,陪我来台江找寻一年后的博士论文田野地点。当年任职于台江县宣传部同时也是文艺作家台江联合会成员的 Deik Bok,就担任我在台江县城的主要接待人。当时,我要选博士论文田野点,想在两个台江县的高坡苗寨(Fangf Bil 与 Eb Diuf Nel)中选一个。因为当年的 Fangf Bil 交通方便,我们一行五人,先来到此进行田野工作。后来同行的杨老师身体不适,和黔东南州文联的一个年轻小伙子便先行离开,他们分别返回凯里与贵阳。

仅 Deik Bok 陪我去 Eb Diuf Nel 村寨。这个村寨对我的研究很有意义,因为它就是吴泽霖先生在1950年代进行访谈与记录的村寨。因为由公路到村寨只能步行,将近两个小时的步行路程,我们谈了台江地区的种种苗族村寨文化。也因这段走路的行程,我和 Deik Bok 成为好朋友。1998年底,我来到 Fangf Bil 进行为期一年半的博士论文工作。而后我回访台江进行研究期间,总是找 Deik Bok 帮忙。也因为他,而认识他的妻子与妻妹徐晓红,并和晓红成为好友。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期间,我曾在晓红家住过。1998年冬天的某个夜晚,晓红给了我两条毯子盖,至今温暖仍在。后来因

为晓红离开了台江去凯里开铺子，我从山上村寨下到台江时，才开始去老县长张明达伯伯与周运荣伯母家住。两位长辈待我如亲人，至今难以忘怀。

1997年以来，我与 Deik Bok 的多年好友情谊，使我似乎有一种较多层次的方向来整理与回溯——Deik Bok 如何看待他的一生以及在生命史历程里的城乡移动经验。对我而言，探索 Deik Bok 的生命史叙事，一方面是所收集、描述与分析的资料（也是经验现象本身），一方面是一种展演、存有、语言的实践。如人类学家 Janet Hoskins^① 在 *Biographical Object: How Things Tell the Stories of People's Lives*（《传记的物》）一书所说，生命史叙事的研究并不是在面对一个既存、固定的文本，而且所有的叙事都不是轻易就能被发现的。因为人在述说自己的生活，并非只是提供关于自己的资讯，同时也是以特定的方式向外面的世界宣告在述说故事的当下自己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就如印度尼西亚东部的 Kodi 人，以叙述自己亲密、贴身之家常物的故事来述说他们的生活、生命经验及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并由物与故事作为中介表达出他们对自我的观感及看法（selfhood）。

（一）早年的教育与移动经验：西南村寨与施洞镇（1959～1972年）

Deik Bok 1959年出生于台江县革一乡大塘西南苗寨。他说6岁那年（1965）开始在大塘小学上学。念书时遇上了“文化大革命”。由于叔叔在“文革”时曾写标语反对，因此 Deik Bok 在小学毕业后，差点念不了中学。他回想，幸好有生产大队的会计帮忙“填表格”，才得以去念中学。1970年他进入施洞中学就读，两年之后（1972）中学毕业。

Deik Bok 早年的生命史，呈现出几个重点。其一是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经验。

我的外婆是地主，我的叔叔是反革命分子。小的时候，我就到大塘小学去读书。那时候读书不差，就调皮一点，不认真。到“文化大

^① Hoskins, Janet, *Biographical Objects: How Things Tell the Stories of People's Liv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革命”，读书上初中是靠领导推荐。

提到“文革”，他的感受是恐惧的。这个感觉源于“文革”时期在小学的经验：

心里面经常有一些恐惧，有这样的感觉。有一次我不知道是我们在黑板上写一个什么，现在记不清楚了，写一个什么字。后来就遭到学校批判。

另外一个重点是早年的教育与首次的移动经验。这里的教育指的是 Deik Bok 在当上“国家干部”之前的基础训练。早年的教育使他在以后得以更进一步进入不同层次的国家干部教育（农村干部）。在他早年的生命史经验里，生活的情境是得仰赖不断地劳动以换取“饭票”来维持生活：“当时读书都是很辛苦的。我们家里面人口多，亲戚（生活）困难，我们每一个人都自己砍柴去卖。一根五毛或一块。那五毛钱相当于现在的十几二十几块。”

Deik Bok 在中学求学时，施洞镇正处于刚刚开始发展的阶段。当时在共产主义的国家治理脉络下，镇上的农事活动充满着人际网络的情谊：“没有现在热闹，一个小小的镇，小小的街。当时学生经常出去，去支农。我们每一个星期都去帮助农民。”施洞也在行政区域上经过了变革：“施洞镇那里就是说，原来是一个区，管十个乡镇。”Deik Bok 在对早年求学的回忆中，充满着对于外出接受教育的渴望：“（去学校的路）很远，但也觉得快乐。”而且这种渴望的浮现，还与他心中父亲的形象相互交缠：“那时候我父亲在施洞工商局工作。有时候我跟父亲，我们俩一起返家。在半路就去砍那个可点亮的松油柴。我父亲那时候就爬到很高的松树上面，去把它砍下来。我也帮忙挑着回家。大概也要走二十里路。”

（二）青年到壮年的移动经验：从镇到城，从工作到打工（1973~1994年）

1972年 Deik Bok 在施洞中学毕业，1973年开始在村办小学教书。这时候的他，已经开始涉足地方事务。除了当一名教师，Deik Bok 也当计分

员。在村办小学的工作维持了7年。期间曾经考过高校（1976），但没有考上。直到1980年，Deik Bok才考上农村干部。而这个时间点是重要的。一来Deik Bok正式进入党校，换言之，是进入了国家干部的预备队。二来，在台江莲花书院两年的党校生活，使Deik Bok初次来到台江县城。由空间的移动来解读，我们可以定调，Deik Bok开始进入了可能体验现代城市的经验。他回忆道：“就是很向往到台江，因为可以去读书、工作。”

2011年我通过在台江与Deik Bok所进行的生命史访谈、对话，可从他的个人经验对照出，1980年代与2011年，台江县城在空间与生活上的差别。就Deik Bok而言，经由金融、科学知识与军事训练，在1980年代的台江县城，地方、个人与国家有了新的关系并且面对新生活的进展。“当时这个地方都是农田。就那个老街啊，现在的教育局，这些地方，才有房子。”民众开始可以向银行贷款。Deik Bok进入党校的条件是“农业科技”，因此学习了植物学。学习结束之后，1982年3月，Deik Bok到武家庄、镇远，接受军事训练。1983年，他被派到平兆公社服务，负责管理民兵。1984年4~5月，被调到施洞公社工作。这年Deik Bok去考了成人高校并且结婚。同年8~9月，他到位于麻江县城的贵州广播电视大学进行党政专业的学习。两年的党校学习完毕之后，开始在台江城里生活。从1986年开始，到县委办公室工作。

这一年，Deik Bok的大儿子出生了。1987年，喜欢写作的Deik Bok开始创办《台江文艺》（他对此刊物投入的工作，一直持续到退休前）。1989年，台江有了第一家歌舞厅。1992年施洞乡改制成“施洞镇”。1991年Deik Bok开始在宣传部工作。回忆1986年起在台江城里的生活，Deik Bok提到居住的经验：“当时住那个房子是在县委过去的木房，在新街，在大炮台的半坡上。生活比较困苦。”也提到当时的生活休闲：“钓鱼啊，不，不是，是打鱼啊。上坡去找蜂蛹，炒来吃。”“当时只有一个歌厅。我们去跳舞啊。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多（歌厅）。”在访谈的2011年，当年的第一家歌舞厅已经不复存在，“已经撤掉了”。

在访谈进行时，Deik Bok也针对1990年代起，当一个在城里的台江人，与在村寨生活的差别，做出了自身的诠释。

村寨是维持一点基本生活就可以，没办法买高档一点的衣服，特别是买房子。这种问题很麻烦。(19) 92、(19) 93 年开始搞房子的改革，我就买我老婆大哥的房子，那个房子有八十几平，要四千块钱。那时候我没有钱，没办法，就跟很多人借，都借不到。后来跟一个重要亲戚借贷……

很明显，对他而言，两者的差异在于，自 1990 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在都市的住宅政策所带来的影响。这也形成一股推力，让一个在县城已经有工作岗位的国家干部，因需要还清房屋的借贷，而往外走，到大城市打工。

到外地工作，就是 Deik Bok 口中的“打工”。这也是他生命中重要的经验之一。1994 年，因为到外地打工，Deik Bok 头一回走出贵州。他说，打工的同伴“有来自湖北、北京、四川的同路人”。虽然只有短短两个多月，但是已经让他对于外地的工作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贵州的经验。一开始他是在亲戚的压力之下，到外地打工的。基于对写作的兴趣与能力，他先去了《深圳日报》应聘编辑，但没有结果。于是他留在深圳，当了工地的建筑工。

对于 Deik Bok 来说，在深圳打工的经验是不太舒服的。这种不舒服，牵涉到一种劳动的异化感觉，一种挤身都市里的身体感：

在那里做工，他就是指挥你，指示你。有一种好像心里有很大的压力。在都市里面心情很压抑。然后很热。

我当时没有写（作）。晚上太热，要起来冲几次凉，才能睡。那个蚊子特别的多。早上你起来一看那个四周都是蚊子，真是太可怕了。当时我们去深圳的时候，蔬菜也不是很贵，还是很便宜的。

（三）回到台江、宣传部转文联、结合社会资本与经济的“新时代”（1994 年 5 月之后至 2013 年）

结束 1994 年 3~4 月在深圳短暂的打工后，Deik Bok 于 5 月返回台江，回到宣传部工作（1994~1996 年）。这时候他在宣传部做文书工作，但偶尔

会与上司有摩擦。而 1994 年到深圳“打工”的经验，似乎让 Deik Bok 很受挫，直到转任县文联的工作（1996~2012 年）他都没有再到大城市打工。对他来说，在县城“工作”比较舒适——“我觉得在小城市愉快一些”。

我是在 1997 年夏秋之交到台江寻找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点时与 Deik Bok 认识的。而根据他的生命史口述，也是在 1997 年至 1998 年间，开始与妻子进行饭店投资，如北海人酒店、山林酒家、项大王酒店。连这些酒店（饭店）的命名，都不改他作为文人的性格。另外，Deik Bok 作为国家干部，也屡屡与国家大力推行的经济、都市改革、住房政策高度贴近。2004 年县政府的政策鼓励乡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居住：“县里面有个政策，为了增加城市人口，把家里面的钱，拿到这里（县城），给你八十平方（米）的新房子。我们在参加工作以后，生产队已经退掉了，田也已经没了……（只能）一边工作，一边搞饭店经营。”这时候甚至通过不同方法的融资使得饭店经营得以成功：“没有钱，就是这样，到寨子里面，叫每个人给贷（借）几千块钱。到后来才有那个贷款，到银行贷款七万”，“有生意，一个月可以赚个一万、两万”，“2004 年，是暗中借贷的，用我的房子抵押。用工资来还，一个月扣六百多，贷十五年，现在剩下三万多（没还）”。除了经营饭店，Deik Bok 还曾经接手经营石场与养羊的牧场。但后两项都没有持续多久便结束了。

我的文人朋友，是我在台江苗族文化进行田野工作的引路人。他不仅是热爱创作，办文艺刊物，投稿报刊，写专栏的作家，也是与上司偶尔有摩擦的国家干部；尤其也算是个会投资的生意人。对于有生意头脑这一块，作为 Deik Bok 多年的好友以及十多年来在台江往返，进行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却毫不知情。因为之前，我们总是谈论着 Hmub 昔日与当今的村寨文化。我一直以为热爱写作的他，始终是个在台江工作的文人。直到 2011 年进行生命史访谈时，我才知道自己是个天真的人类学家。

从 Deik Bok 的生命史叙事，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①之后，一名国家干

① 改革开放是 1978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一条“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一决策扭转了中国自 1949 年后逐渐对外封闭的情况，使中国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http://zh.wikipedia.org/wiki/改革开放，最后访问日期：2015 年 1 月 29 日。

部是如何逐步适应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潮流而熟悉这种当代生存的工艺,我认为的是与现代性高度相关的。另外,可以看到的是,在台江城头的经济资本累积与事业的经营,除了要熟悉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得仰赖 Deik Bok 原有的很多社会资本。从筹资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端倪。他的事业资本,是由家乡的田产转化、家乡的亲戚借贷而有了第一笔资金。换言之,由 Deik Bok 与市场资本接轨的故事,我们得以窥见在中国的地方社会中,贵州东部 Hmub 人以亲属关系为基底的人情网络与地方社会的影响力,实则牵连着重 Hmub 人因移动经验所呈现的现代性。

四 再见 Deik Bok: 退休了的国家干部与 一个新的世代 (2014 年至今)

2014 年夏天的台江田野研究,我再见到 Deik Bok 时,他已是退休了的国家干部。我在田野笔记里很自然地用了“再见”这个字眼。这有两层心情:其一是 1997 年以来,从博士学位论文的田野到担任大学教师之后持续的科研工作,每隔两三年,我总在回访台江的田野研究之行与好友 Deik Bok 再见、叙旧;其二,当 2014 年我回访时,台江县城及其周边或远或近的高坡村寨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的变迁或发展都更为剧烈。而我的朋友 Deik Bok,也从国家干部岗位退休了。对于我,那似乎是在台江的人类学研究之旅的一个暂时句号。那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新世代与新时代的开始。我向过去的台江,道别、再见,也是向我的老朋友,Deik Bok 大哥,道别、再见。

因着 Deik Bok 的生命史经验以及与他同辈的 Hmub 友人,一群在县城退休的国家干部或地方干部的经验,或再现的退休生活,我将描述与阐述在台江城,以 Hmub 的读书人或干部所经验的现代性,如何有其独特的在地意味并可作为一个讨论的范畴。退休,通常指涉的是劳动状态、劳动时段与正常的“工作”执行到某一个阶段之后,进入长期或永久的结束。“退休”或许延续当代台江城头所展现的物质与经济生活面向的现代性,又或许是有其冲突的样貌。换言之,倘若 Deik Bok 对于现代性的体验不惟

关联着一种特殊的文化与历史、族群化场域的处境以及情绪或身体经验的感受，同时也衍生出某种普同、均值的时间感。

处于台江城头的国家干部的退休样态，能否也视为一种普遍、均值的时间感？是故，当我们回头来看待一场在 2014 年台江城头的一场饭局上，几位近年先后退休的地方干部与国家干部的互动情形，所窥见的一种退休时间感的当代性与集体性。

这是我在 2014 年夏天回访台江进行田野时，与 Deik Bok 等多位自 1997 年以来陆续结识的 Hmub 友人，在台江城头的小馆子里的一次聚餐。当天 Deik Bok 带我走进台江姊妹街，这条台江新建成的文化街，有苗绣、银饰、四川馆子、牛肉面馆子，其中还有教孩童学古筝、茶艺的，几乎都是小学低年级的女孩在学。但这条街大半时间却冷冷清清。雨越下越大，Deik Bok 说：“去你的老家吧！”他指的是在台江城姊妹街开的一家餐馆。店名就叫“Fangf Bil 人家”（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田野地点在离台江县城约二十六里的高坡 Fangf Bil 村寨）。我不禁问：“真的是 Fangf Bil 人开的店吗？”Deik Bok 笑着说：“老板很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在饭桌上，他们聊着 1997 年以来我在台江进行苗族社会文化调研时，一些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往事。其中包含了公安在我的田野工作初期，经常来山上村寨探班，以了解我这个从台湾远道而来的研究者，究竟如何在山里的村寨生活与进行调研。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各自与外地学者来到台江进行田野工作的种种经验。如 Deik Laut Jok，当年就接待过美国来的人类学家 Luisa Schein。大家话匣子打开后，我却同时观察到在当晚的宴客场上，年近六旬的 Deik Ongx 专心地低头看手机。除了一开始他有与我们对话外，后来都在低头弄手机。

这场在县城与一群退休干部的饭局，在酒酣耳热之后，转而呈现着我在苗族村寨所熟悉的氛围——岁时祭仪或生命仪礼后的传统飨宴。宴客的主人家与姻亲之间，热络地相互敬酒、聊天与对歌。Deik Bok 与 Deik Laut Jok，两人对我唱起台江的普通调。Deik Laut Jok 唱起：“我来这里没有什么好的东西，但请你来吃点东西，请你来这里坐坐，彼此在情意上相互交流，彼此的心里都十分畅快。”

饭局里的 Deik Bok 与 Deik Laut Jok 等是同世代的人，都是在 1950 年

代出生，小时候经历过“文革”。他们作为国家干部或地方干部的背景以及经历1980年代后期，中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他们的生命史与工作生涯，虽然有着更多的分化，但也呈现着大体相似的方向。这是我在田野工作中所感受与阐述的一种在县城里，退休的干部社群与样态的均质、普同与日常的时间感。这种恒定的感觉，拨动了现代性进入地方社会所带来的内涵：一方面有其在地的独特性，一方面涌现着均质与单一的日常感。

对照着饭局上与一群退休干部的重逢以及我所感受到的退休与当代性所涌现的一种独特、均质的时间感，和近乎日常或无聊的氛围，退休就个人的经验上，也纠结着一种在县城居住的当代性以及经济的理性计算。

“你怎么就退休了？年纪到了？”我问着眼前的好友。

“为了买相机而退休。后悔了，最近国家干部又提工资，500~2000元。本来是为了可以买照相机。得了一笔钱，退休。结果相机也没买成，都被（家人）瓜分光了。”Deik Bok苦笑着。

2014年夏秋之际，我在台江城头书写的田野笔记，曾在笔记页眉写下了一个小标题“（经济）改革后的国家干部”。这部分的内容，或可置入Deik Bok的生命史叙事来讨论。我们看到，在当代中国国家干部的思维中，国家给予的这个“工作”，是一个相对稳定、拥有工作证的工作，也表示着会有退休年资以及退休金。而同时，国家干部也积极面对市场经济社会，也就是积极参与社会、积极地积累资金。这个例子，可以从国家干部退休后养羊、投资做饭店的事情来理解。在这些国家干部的思维中，是以一种几近经济理性来计算得失的。因此，回到Deik Bok所纠结的后悔退休，便可以明白计算经济理性之于某些国家干部的重要性。

五 生命史历练中，与现代性的几种遭逢

最后，我想回来探讨从Deik Bok的生命史叙事中，可以看到哪些关于现代性之构成与再现的蛛丝马迹。透过2011年我对Deik Bok的生命史访

谈, 可以看到什么? 在现代性的探讨中, 首先回到物质层面来讨论, 可以看到一种实质的变迁, 这些变迁是反映在他自身的空间移动。Deik Bok 的生命史历程, 展现出他在革一、施洞、台江、深圳等不同地方的移动经验以及他在叙事中多次提到的街道景色的变化, 也就是地景的变迁。在 2011 年访谈结束时, 我和 Deik Bok 的对话里, 可以看到他在生命史叙事中, 重新思考文化地景的变迁:

有了较多的酒吧和歌厅……最近一两年, 县城都装上了霓虹灯, 很漂亮。但每(天)晚上, 在广场跳的交谊舞, 那个跳舞, 不少人因此发生婚姻与感情的变化……这种种主要是经济发展, 所带来的变化。不过这种县城的变迁, 是遍布全国的。国家投入很多经费在此。

其次, 另一个现代性体验则是偏向个人感官的感受、情绪、情感, 乃至身体的经验。Deik Bok 对于求学历程的回忆与叙事, 似乎关系着一种民族主义的实践与热情。他一直保持着进取的正向感觉, 如他对于早期的生命史叙事中, 到施洞中学求学的回忆, 充分表达了这种乐观进取的感觉:“(去学校的路)很远, 但也觉得很快乐”, “就是有一种幸福感”。这种进步、乐观、正向的感觉, 到了 Deik Bok 进入农村干部的党校求学时, 还存在着:“到台江就是很向往, 因为可以去读书。”

以上由少年到青年阶段经历的教育过程(党校或是高校教育)都表达出一种共通的喜悦观感, 这恰好可以与完成教育后 Deik Bok 的生命史作为对照。在接受教育的童年和青年的位置上与进入工作后的他, 表达出来的经验感受, 是有差异的。在青少年读书时期, 最大的挫折是“文革”时期以及复杂的社会与政治关系(家族有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反倒是 1990 年代后期, 中年的他到外地找工作, 面对着在外地的打工者身份, 打工所要面对的劳动条件时, 反而显现出一种对工作的倦怠感:“在都市里面心情很压抑。然后很热”, “在那里做工, 他就是指挥你, 指示你。有一种好像心里有很大压力”。这种因为工作带来的劳动倦怠感, 延伸到日后的工作选择, 他还是比较习惯于小城市的生活。

再次, 另一个可以思索的部分, 是 Deik Bok 个人生命中的劳动历史。

在生命史的叙事里,这种劳动的生命样态,反映着卷入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的交错中,挣钱/打工的国家干部的生命过程。在生命史的访谈中,出现了我与 Deik Bok 讨论什么时候是打工、什么时候是工作的对话。根据 Deik Bok 的叙事资料,打工与工作的区分是十分重要的。

那个打工就是苦力啊,或是技术啊,一点点钱嘛。找工作就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像当年,我在深圳如果找到报社的编辑工作,工作的籍贯(档案)就可以调过去。如果你是有一个工作,比较稳定的,就是工作。如果是聘用的,就是打工。

打工与工作之分,使得 Deik Bok 必须在劳动的生命过程中,去寻找一个恰当的工作。因此对他而言,稳定的企业职位,不算是一份“工作”,而是“打工”。有工作证的工作,才是工作。这样的论述,在他的下一代身上持续标记着。Deik Bok 的次子在深圳经营房地产,就被认为是“打工”,而在县城担任公安的长子,则是“工作”。Deik Bok 的劳动历史,恰好反映着当代中国国家政策下国家干部的现状。通过他的生命史叙事,我们可以理解,当代的中国国家干部的劳动史,是透过层层与地方社会相联结的现代化经验,包含着实践、转译、协商、再协商、误现、屈从,乃至弃离等诸多层面与细节的现代化经验、现象与场域,由此与一种无法和国家或地方社会脱离的现代性产生了结合。

总之,从 Deik Bok 一生的城乡移动经验与他当前作为国家退休干部的处境为例,我们看到一个跨越 1950 年代到 2014 年的台江 Hmub 人的个人生命史转折里,所浮现的地方社会、个人、小群体对于现代性的亲身体验与感受。本文以这个民族志作为例子,回应 Shmuel Eisenstadt^①所指出的,若要理解当代社会,应将现代性的发展与历史看成一个连续构成与再构成的多元文化故事。回望 Deik Bok 的生命史,可将他比拟为一个特定时代下的社会行动者。从他参与社会、政治、知识活动、经济活动以及在时代的变动里,所追寻或遭逢的社会行动与体验,来理解一种独特观点下与人生历程中,所构成与再现的现代性。

^① Eisenstadt, Shmuel, "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129 (1): 1-29, 2000.

后 记

因为动乱的年代，李师母幼年时曾跟着外婆在贵州生活了好长一段的岁月。我想，在中国大陆，除了老师出生的家乡泉州之外，贵州对于李亦园老师，应是另一个拥有着独特情感的地方。1996年秋天，成立十年的新竹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招收了第一班的博士生。李老师与何翠萍先生，也开始教授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并指导博硕士生前往中国西南进行田野研究。1996年至今，几乎每年都有研究生只身前往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蹲点田野研究，民族志深描并热情地与当代人类学的亲属研究、人观、空间、交换等当代人类学理论进行对话。美玲何其有幸恭逢其时，成为李老师与何先生的学生并由此开启了在贵州的长期研究。谨以此文缅怀与贵州有着独特渊源的恩师与师母。以此纪念导师。亦园先生于1990年代中叶起，在台湾带领着莘莘学子，开启了以深入的田野工作，进行西南中国少数民族学研究的美好学风。